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伦理特色

乔 洪 武

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管理活动都是一个价值实体,其中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伦理特色进行研究:(1)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任务不是片面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性,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经济管理的根本手段是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而非道德和政治手段;(3)经济管理的根本道德要求是尊重个体及其正当利益,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4)经济管理的价值原则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统一;(5)新一代管理者的人格特征。

经济管理,无论是国民经济管理、部门经济管理,还是企业经济管理,都是对社会生产过程有意识、有目的的控制活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管理活动又都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定的关于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管理思想不仅是对传统经济管理观的重大突破,而且直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今天,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管理思想,深刻把握其中的伦理特质,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阶级社会中,经济管理在本质上总是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管理的职能从根本上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经济管理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职能;另一方面,经济管理又具有维护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职能。同样,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也具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两种职能。然而,究竟如何处理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单纯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性——彻底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还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本位,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目标选择。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伦理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本位,反对片面以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纯洁性为本位的传统管理观。

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完全。在论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时(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又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他的这些论断清楚地表明,不论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看,还是从经济体制,即社会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和生产运行规则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两方面的职能都要从属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尤其是经济管理生产关系方面的属性,一定要以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不断地进行改革,最终建立起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也就是说,管理职能的两重性都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展开。

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经济管理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本位的思想,对于我们摆脱传统管理观的束缚,确立新型的经济管理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我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管理思想认为,管理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是社会道德的纯朴和谐,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属于这一根本目标。孟子云:“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兵兴,丧无日矣。”^①几千年来,儒家所竭力维护的道德,当然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道德,因此,他们的管理思想以维护社会道德的纯洁性为本位,其实质就在于维护封建社会固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的传统管理思想对我们经济管理的思维模式仍具有很强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任务是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性,已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势。正因如此,从1958年起,我们不断地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摒弃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1958年试图通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找到“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失败以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试图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思潮广为泛滥。诚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②“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③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④正是由于“左”的错误理论,才导致了我国长期处于贫困、停滞和落后状态。而且,由于“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⑤象凡事都要问清了姓“社”还是姓“资”才放心,等等。这实质上仍然是在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立场,仍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儒家管理思想“道德至上论”的传统。其实,列宁在提出以“新经济政策”来取代试图充分体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⑥在当今开放的时代里,面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示范”和挑战,如果我们的管理还只是围绕着“怎样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越纯越好”、“怎样使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越快越好”这一类“左”的中心来进行,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最根本的任务,我们就不能尽快地消灭贫穷,贫穷则有可能消灭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本位的思想,在理

论上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实践上是我们把握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真谛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

二

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管理,还是微观的经济管理,究竟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还是以非经济的(政治和道德的)手段为主,这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论。邓小平在力主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本位的同时,还积极推进我国传统管理方法论的变革,强调“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⑧,坚决反对以政治和道德的手段代替经济手段,从而为管理目的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

邓小平强调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管理中应该强化而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应该健全而不是放松经济责任制,坚决反对“大锅饭”或按政(即政治表现)分配的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率先提出过破除“铁工资”的主张:“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⑨。1978年3月,他又明确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不能搞按政分配和按资格分配。^⑩同时,他多次强调应该建立和健全经济责任制,对劳动者应该“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⑪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社会财富远未达到充分涌流的水平,社会分工也继续存在。所以,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采用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与人们“谋生的需要”之间联系最为紧密,作用最为敏感,效果最为显著。这一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因此,邓小平十分肯定地指出:“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⑫

第二,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邓小平认为,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就是要承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有地位,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好市场调节的应有作用。在1989年平息“六·四”风波,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就曾坚定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⑬1992年初,针对一些人长期存在的搞市场经济就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担心和只有计划经济才是搞社会主义的偏见,他再度阐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根本目的就是告诫我们,管理经济从来不能只靠政治原则、道德原则和行政命令,而只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来进行管理。反之,“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⑭

“以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这个看似平常的道理,在我国和原苏联等国却长期得不到认同。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管理经济失败的教训时,就曾指出,我们曾打算用人民的政治热情来直接完成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

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⑧尽管列宁所推行和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得以恢复,但斯大林并没有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长期战略方针。从1929年起,苏联又进入了采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进行统一计划管理的实物化经济模式——“斯大林模式”时期。

我国建国以后,除照搬苏联模式以外,还存在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即强调以道德的手段作为管理社会经济的主要手段,否定经济和法律手段的主要作用。因此政治和道德手段一直被当作我国经济管理的根本手段。早在50年代末,毛泽东就曾指出:“在我们社会里,价值法则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就是不起决定作用。对我们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主要是计划调节。”^⑨在60年代,他又批评刘少奇等人“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⑩,是在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在他的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我国在十年“文革”时期,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政治和道德手段完全取代了经济手段,“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划上了等号。正是由于长期摒弃“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价值观,我国经济发展总是难以走出高速度——低效益、“大跃进”——大后退的怪圈。而邓小平同志强调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正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以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是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管理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价值原则。

三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重整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一直居主导地位。这不仅与儒家管理思想虽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但又恰恰缺乏重视个人利益和地位的传统流弊具有密切联系,而且与我们简单地批判和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管理重视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有关。人们不会忘记,在“文革”时期,“哪怕是对个人利益最微小的考虑,也会受到道德上的严厉谴责。”^⑪尊重个体利益和权利,就等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已经积淀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而在事实上,抹煞个体(或小集体)的独立利益及其存在价值,就等于抹煞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就等于自我束缚了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因此,这种落后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心态所滋生的必然是落后的管理方式和成果。

邓小平的经济管理思想鲜明地表现出尊重个体,重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有机结合,反对只顾整体,轻视甚至否定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⑫1980年,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关于“共产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利益”的提问时,肯定地回答道:“承认。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⑬那么,怎样实现这种结合呢?首先,作为经济领导主体的党和政府不应该惧怕和限制人民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积极性,而应该支持、鼓励和帮助他们实现这种利益。“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⑭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对与错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是

否将国家整体利益的增强与老百姓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统一起来,既不能只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更不能象我们以往那样片面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否则,不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处于贫困状态,国民经济也会因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次,劳动者个人和集体应该享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决策权。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论及农村出现包产到户的情况时就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③根据这些思想,我国不仅进行了农村经济改革,给农民以充分的经济自主权,而且进行了城市经济改革,给地方和企业经济自主权,国民经济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巨大进步。近几年来,广东、江苏等地和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业已证明:越是敢于放手,给企业以充分的经济自主权,就越是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对于经济行为的主体——个人或企业来说,既应该争取和拥有自己的利益,更应该兼顾到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④以上三点,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道德要求。

四

“重均平而抑分化”是我国儒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伦理原则。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儒家并非主张绝对平均,而是强调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封建等级制度的“礼”为准则来实现利益均衡,不可使富者太富,贫者太贫,以免导致社会的动乱不安。但由于我国队伍最为庞大的农民阶级普遍具有平均主义思想,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很容易被推向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并成为中国社会的思维和心理定势之一。这一传统对建国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均平而抑分化”演化成“大锅饭”分配模式。一个时期中,这一模式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最佳途径。但事实上,它正是导致我国经济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价值原则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乃是一种动态的统一,既不是宁要绝对平均而不惜共同贫穷,也不是永远只顾效率而不顾两极分化。

首先,社会主义的经济分配政策应该拉开和保持一定的利益差距,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1978年他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⑤最近他又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邓小平反对绝对平均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肯定由多劳多得而导致的收入差别完全符合社会主

义公平原则。另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实际占有的生产资料存在优劣之分,正视和肯定由这一差别所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和收益不平衡,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不鼓励在这方面吃“大锅饭”。这两个方面又都突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伦理: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仅会带来直接的善——增加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经济收益,而且会带来更加广泛的善——富的示范作用以及这种示范对于整体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促进作用。

其次,拉开利益差距、促进效率提高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②最近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由此可见,邓小平所倡导和坚持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一是:既注重运用不平衡机制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始终坚持反对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在当前“寡”突出时首先“患寡”,而当“不均”突出时就要重点“患不均”,以保证富的愈来愈富,穷的也由穷变富且愈来愈富。

五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古”,其表现是重过去而不重视现在与未来。现在的东西只有与过去的相吻合才是好的,凡事都要问问先王怎么说,然后才确定自己怎么做。诚如 F·R·Kluckohn 先生所说:“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以过去取向为第一序的价值优先,祖先崇拜和一个很强的家族传统,就是这种优先表现的两个例子。因此,在中国人的态度上,没有什么新的事物发生在现在或未来,所有的新事物,都已发生在遥远的过去。”^③这种价值取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就是突出典型。显然,崇古与拒变是一对孪生子。不克服崇古取向,我国管理的思维模式就不能挣脱旧时代、旧体制的樊篱。正因如此,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始终把改变崇古价值取向作为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管理人格的首要工作。

早在 1978 年,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精神迷信,他就尖锐地问道:“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⑤翻阅《邓小平文选》和他的其他论著,我们不难发现,“解放思想”是他讲得最多的关键词之一。由此可见,思想解放,不迷信先哲,实事求是地对待先哲,是邓小平所偏好的现代管理人格的首要特征。

其次,新一代管理者必须是敢想、敢干、敢闯的闯将。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大声疾呼:“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

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②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他又鼓励我们: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可见,邓小平殷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而且还要履行好促进群众解放思想的义务。

最后,新型的管理者还必须具有反对论资排辈,“家有一老,胜似一宝”的传统偏见,敢于不拘一格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品格。邓小平不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破除了我们党长期存在的事实上的终身制,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进步“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③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中“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④价值观。他肯定地认为:“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⑤只要我们大胆启用这样的一代新人,不仅我国的社会经济管理水平能够迅速得到提高,而且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也能够迈开更大的发展步伐。

注 释:

① 《诸子集成》(一),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87页。

②⑫⑮⑳㉑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6、12、99、78页。

③④⑤⑦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5、27、21页。

⑧⑨⑩⑪⑬⑭⑯⑰⑱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11、98、142、136、310、135、297、142、123、133、134、197、245页。

⑥⑬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6、571—572页。

⑬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人民日报》,1989年6月28日。

⑭ 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⑮ 转引自:张友仁、李克纲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⑰ 转引自:《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⑱ [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㉒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㉗ 转引自:韦政通著《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